

采访杨成武将军

张东升

198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坐落于十渡村南卧龙山山头的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落成并举行落成典礼。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时期在平西这块土地上牺牲的革命烈士而建。平西，指北平西部包括宛平、房山、良乡、昌平、涿县、涞水、蔚县、涿鹿、怀安、阳原等12个县在内的一片抗日根据地。北平即北京，1928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北京改为北平，设北平特别市。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又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平西抗日根据地，又是北平外围第一块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这天，不少曾经在平西战斗过的老同志都来了，其中最著名的要属肖克将军和杨成武将军，此外，还有曾任平西地委书记的马辉之、李德仲以及曾任平西地委宣传部长的张明远等。

典礼安排在下午。接待安排在十渡山光旅社。当时，旅游业刚刚起步，一切设施都很简陋，旅社只有贴山坡依山而建的几排平房。得知杨成武将军要来，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了旅社，目的就是特意采访一下杨成武将军。负责采访的有我和贾自为。我们俩都是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编纂人员，我的任务是负责采访，主要是负责提出问题并做好记录，采访后要负责整理。贾自为主要负责摄影。1982年，经县委常委研究，决定成立房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为临时常设机构，任务是编修《房山县志》。但县志还未编修，就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调查整理房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编纂“革命斗争史”。编史修志，史料的考证是一大难题。为什么要采访杨成武将军？因为根据调查，有一段历史直接和杨成武将军有关，但也只是听一些知情者传说，既没见到文字资料，更没有和本人核证，所以虽然知道事情重大，但迟迟不敢落笔，这就是有名的“王家台惨案”。

1938年8月初，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不足半年时间，一支八路军部队去宛平执行任务，路过霞云岭地区的王家台，被以杨天沛为首的当地民团和土匪围困在深山峡谷之中，八路军一连人几乎被全歼，造成了震惊平西的“王家台惨案”。事情重大，但疑问一个接一个：这支八路军部队究竟有多少人，由谁带领？被包围后，八路军一定会想方设法冲出去，战斗经过怎样？八路军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有没有人冲了出去，或是被人救出？出去的人后来怎样？……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落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存真求实”，才是真正对历史负责。采访杨成武将军，一是机会十分难得，因为只有像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

落成典礼这样重大的活动，杨成武将军才会露面。二是如果采访不到杨成武将军，王家台发生的事就很难落笔，这样的大事件，又和杨将军有关，也只有和杨将军本人核证才能弄清。别的不说，仅以八路军牺牲的人数来说，当时传说得是八路军一连人一个没剩，全部牺牲。这里附带说一句，十渡烈士陵园之所以能落在房山，和已故的曾任房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张成基同志分不开。关于王家台八路军牺牲的数字，张成基主任就坚持说“八路军一连人全部牺牲”，他之所以这样说，也是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总之，王家台发生的围困并袭击八路军的事件，有很多待解之谜！

杨成武将军是下午一点左右到的。说实话，要采访这样一位威名赫赫的将军，我心里也有点忐忑，但有一点我相信，就是我的采访一定会成功。记得杨将军到了后，工作人员把他让到旅社稍靠后一排，临近上坡的走道边的一个两间的屋子里。我已和工作人员说好，说明我有采访任务。工作人员说要采访也得快点，因为一会儿还有领导要来，人一多，就不好采访了。我也知道如果不抓紧，采访很难完全满意。于是，在工作人员把沏好的茶端到杨将军面前时，我走过去，说明了来意。杨将军便伸手示意，要我坐在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我的笔记本和钢笔早预备好。采访前，我不由打量了一下杨将军。杨将军生于民国三年，即1914年，到1985年，已是70岁高龄，但看着却一点也不像是个古稀之年的人。他个儿高高，面皮细润而白皙，只是有些秃顶，说话不急不忙，慢声细语。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难得的倜傥洒脱，一副儒雅的风度。须知，杨成武将军是1955年首批授衔的开国上将之一，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杨将军曾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团长，在华北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斗争，抗日战争后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眼前的杨将军，跟想象中的杨将军判若两人。我不由想到了他写的《长城抗战》一书，由此也对杨将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知道他是个文武全才，在战场上是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指挥员，拿起笔来，又是个能著述立说的儒将。

因为时间紧，我不得不就所要弄清的问题一一提出，要杨将军直接解答。第一个问题是在王家台遭到围困的八路军是哪一支部队，是不是他的部队？难得的是，事情过去了四十多年，杨将军对事情的主要经过还记得。他说，在王家台遭到地方民团围困的不是他直接领导的队伍，是前去增援他的部队。于是，杨将军讲到了当时的背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西山一带先后出现了好几支地方武装，百姓统称为“西山游击队”。其中平西抗日游击队人数最多，司令员是东北人，是个大学生，名赵侗。为了改造这支游击队，使之真正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中共党员汪之力、陈大凡、焦若愚、史进前等曾被派到游击队中做政治工作，并在部队中发展党员。这支部队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东北义勇军的一些人；二是曾在孙殿英手下干过的一些人；三是共产党派去的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司令员赵侗同意队伍改编为八路军，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改编为八路军五支队。赵侗仍任司令。但赵侗想扩大个人

权力，闹独立性，并曾几次想和一些土匪勾结，后来，即 1938 年 8 月初，终于带一些人去投靠南方的国民党。赵侗原想带一个大队逃跑，结果多数人不跟他走。紧接着，五支队的一个大队又公开叛变。形势骤变，为稳住平西局势，聂荣臻司令员派独立师师长兼政委杨成武火速赶赴平西，处理赵侗叛离一事。接到命令，杨成武率二团一个营和分区特务营星夜兼程北上，由涞源城出发，经紫荆关，过野三坡，直奔宛平斋堂。杨将军带人走的是百花山背阴面，即西北面，也就是属于宛平地界的一面。杨成武带人走后不久，聂司令员又派新三团政委带一个营前去增援，准备第二天赶到斋堂，其中，一连人和一个营部在王家台遭到了民团的伏击。

杨将军讲的极为详细，看出来，对王家台发生的事，他的印象很深刻，讲时内心并不平静，讲述时，似乎是在有意克制自己。我问：“经过霞云岭的八路军究竟是多少人”。杨将军说“增援的队伍是一个营，分 3 个连；一连驻霞云岭；三连驻堂上；走在中间的是二连加上一个营部”。我又问：“具体是多少人”。杨将军思谋了一下，还细算了算，说是 130 多人。我说：“上书是不是可以这样写”。杨将军说：“可以”，还说：“也就是这个数”。我问：“新三团政委是谁”。杨将军却怎么也想不起名字叫什么了，只说政委姓张，是“张政委”。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后来，在执笔写《房山人民革命斗争史》时，只好不写名字，只写“张政委”，就是这个原因。

杨成武将军也是在事后才得知事情经过的，但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能说个大概。于是，他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原因，简单讲了事情的经过。讲到八路军战士的牺牲，他感到分外痛惜，因为这些八路军战士来自全国各地，本来是去前线打日本的，没想到会死在地方民团和土匪手中，而且死得很惨。

我问：“在王家台，是不是一连八路军战士全牺牲了”。杨将军说：“没有，有一部分人出去了。”听到这一句，我不由兴奋和激动起来，因为这不仅解决了史料考证的一个重大问题，推翻了此前传说的“一连八路军一个没剩”的传言，而且更令人鼓舞和兴奋的，是我们还有一些战士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一结果，不是亲身调查这一史料的人，内心的兴奋和激动是绝难体会的。

接下来，是八路军战士牺牲的具体数字。因过去了四五十年，杨将军确实很难说出具体数字了。这时，在一边的贾自为，提到了一个名字——王茂全。王茂全曾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是马辉（马豁子）的副手。贾自为去河北省石家庄市采访，曾见到王茂全。贾自为说出“王茂全”来，是想进一步和杨成武将军核实这段史料。这一来，杨将军想起来了，说王茂全当时是营长，增援他的部队，由新三团张政委带队，营长就是王茂全，张政委牺牲在王家台，王茂全则带领一部分人突出了包围圈。问具体有多少人脱险，杨将军就说不准了，只说出来不少人，大概有七八十人。“出来七八十人”！这一结果，和传说的“一个连一个没剩”相差太远了！惊疑之中，我再次问杨将军，杨将军说“是出来不少”。

这时，又有一些前来参加典礼的领导来到了山光旅社，屋外人声也嘈杂起来。采访临结束，我问到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房山上方山一带活动的抗日同盟

军问题。杨将军立刻反应过来，而且，他还提到了一个在房山和涞水、涿县几乎尽人皆知的名字——胡嘎巴。我说，胡嘎巴就是房山人，是娄子水村的，叫胡振海。我问：“百姓都把这伙杂牌军叫土匪，从历史的角度看，叫什么合适？”杨将军说：“叫人家‘土匪’是不合适的，因为胡嘎巴也曾打过日本呀。”后来，杨将军思谋了一下，说就叫“杂色武装”吧。杨将军一句话，胡振海一伙才摘掉了民间称呼多年的“土匪”的帽子，后来上书时，就写上了“杂色武装”。

本来我还要问几个问题的，但这时有工作人员进屋，告诉肖克将军到了。杨将军马上起身迎了出去。我和贾自为走到屋外，就见杨将军十分恭敬地走上前，伸手搀住了肖克将军的一只胳膊，把肖克将军扶进了屋。其实，肖克将军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杨将军走上前去搀扶肖克将军，或许只是一种礼节。由此，我见到了杨成武将军的另一面。

采访杨成武将军，终于把王家台惨案的一些主要问题澄清了，但还有一些问题要进一步核实。为了彻底弄清八路军战士牺牲的数字，我到了霞云岭乡，见到了“文革”时期整理的一份有关王家台惨案的材料，材料整理的十分详细，被困在王家台深山峡谷中的八路军战士，曾几次想冲出去，但由于民团控制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始终没有成功。有的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到了第三天，民团和土匪冲下山，一些战士被活捉了，凡是被捉住的战士，都被残忍的杀害了。“文革”时期整理的资料，详细地记载着，在某某地方，几个战士被活埋，在某某地方，几个战士被石头砸死……一个一个数，总计八路军战士在王家台牺牲了55人。那么，有多少战士出了包围圈呢，又是怎么出去的呢？原来，在八路军战士被围时，房山和良乡联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上石堡村书记于进琛，秘密派出一个叫贺老五的，钻山缝进去，又从山缝出来，秘密带出来八十多人。贺老五后来也被当地民团残忍杀害了。震惊平西的王家台惨案，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至此才有了个相对真实可信的结果！

张东升：原史志办主任